

东篱下



书囊萤语(十六)

贾九峰

《小团圆》

《小团圆》的出版颇费周折。

宋淇夫妇去世之后,他们的儿子宋以朗先生便继承了张爱玲作品在港台的版权。他写的整篇序言也基本在说《小团圆》出版的合情合理合法。1992年2月25日张爱玲在给宋淇夫妇的信中最后一次提到《小团圆》:“还有钱剩下的话,我想用在我的作品上,例如请高手译。没有出版的出版……(《小团圆》小说要销毁。)这些我没细想,过天再说了。”

宋淇夫妇没有同意即时出版《小团圆》,完全是出于对张爱玲的保护。他们担心时在台湾的胡兰成借此自我炒作,给张爱玲带去新的纠缠与困扰。他们提出的修改意见也主要集中在邵之雍这个人物的设定与结局上,不想借给胡兰成一架青云梯。张爱玲在当时接受了这份好意,但不知为何直到最后,都没有完成修改(她可能根本没有动笔修改)。

宋以朗先生在序言中写道:“胡兰成早已过世,那一份担心可以视为不存在了。”他从更多的信件中分析,张爱玲说要销毁《小团圆》既不是她的本意,也不是她最后拿定的主意,所以《小团圆》可以出版,不必像卡夫卡那样被视为“背叛的遗嘱”。

《小团圆》怎么可以跟《变形记》攀比呢?在张爱玲的全部作品中,《小团圆》最多算一篇中下乘之作。自从张爱玲移居美国,她的创作才能几近枯竭,除了修改和翻译自己的作品,她几乎没有拿得出手的小说。《小团圆》她也是写写停停,近于难产,这样就知道她封笔之作的质量了。

伤痕文学

季羨林在《牛棚杂忆》中写道:“虽然有一段时间流行过一阵所谓‘伤痕’文学,然而,根据我的看法,那不过是碰伤了一块皮肤,只要用红药水一擦,就万事大吉了。真正的伤痕还深深埋在许多人的心中,没有表露出来。我期待着当事人有朝一日会表露出来。”

1978年初,大一新生卢新华将他的处女作《伤痕》贴在了班级墙报上,一时间,这篇小说在复旦校园迅速传抄。《文汇报》为了让《伤痕》顺利发表,提出了16条修改意见。8月11日,刊登小说的《文汇报》一日加印至150万份。读《伤痕》,全中国人所流的泪可以成为一条河。在当代文学史上,这便是“伤痕文学”的肇始。

后来在美国生活的卢新华说:“‘伤痕文学’注定是短命的。”这也印证了季老对“伤痕文学”的看法。

招生

1978年8月,陕西第八棉纺织厂革委会收到北影致函:(一)学院经过看张艺谋作品和面谈,为了让他有深造的机会,经过慎重考虑,决定破格录取;(二)根据上级文件规定,张艺谋已经工作满五年,所以上学期间请原单位照发工资。并请厂里给张艺谋作一个政审,由张本人带回。

那一年,张艺谋曾下乡做了三年农民,又在棉纺织厂当了七年搬运工,28岁的年纪已经超出北影招生规定的最大年龄六岁。年龄是死规定,人人爱莫能助。文化部长黄镇爱惜人才,有了他的过问,事情才出现如上转机。

2004年,清华美院博士生导师陈丹青辞职。在辞职报告中说:“我之请辞,非关待遇问题,亦非人事相处的困扰,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。”他不认同的一点正是:不少考生因为外语和政治两门成绩不合格,而与艺术学院失之交臂。

与我当年考研外语不及格相比,张艺谋是多么幸运。

士

新文化运动时期,章士钊与鲁迅分属于“文言”和“白话”两个阵营,其间有一小段关于“士”的争辩。

1923年,章在上海《新闻报》上发表《评新文化运动》一文。文中借“二桃杀三士”典故,讽刺白话文之不可取。“二桃杀三士。谱之于诗。节奏甚美。今日此于白话无当也。必曰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。是亦不可以已乎。”

鲁迅当即撰文指明,“二桃杀三士”典出《晏子春秋》,是晏子设计用二个桃子杀了三个武士。“三士”非为“三个读书人”。他借机讽刺:“旧文化也实在太难解,古典也诚然太难记,而那两个旧桃子也未免太作怪:不但那时使三个读书人因此送命,到现在还使一个读书人因此出丑,‘是亦不可以已乎’!”

1925年9月,章在《甲寅》周刊上重发《评新文化运动》一文。按语中写道:“此等小节。宁关谋篇主旨。且不学曰学。其理彼乃蒙然。又可晒也。”鲁迅毫不示弱,亦将原批评文章于《莽原》半月刊重新发表。

其实“士”在春秋时期是一个特殊的阶层,介于卿大夫与庶民之间,处于贵族的最底层。在文化上,士要接受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术等多种教育。既是读书人,也可充任武士。雷海宗先生在《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》一书中解:“当时的人可以说没有文武的分别。士族子弟自幼都受文武两方面的训练。”士是文武兼备之人,有健全的人格,有自己的信仰,视荣誉为生命。雷海宗先生说,战国之后,这种文武兼备全面发展的“士”基本上绝迹了。

基于此说,有人讲汪曾祺是中国“最后一个士大夫”,我认为这是不准确的。汪先生也未必认这顶帽子戴在自己头上。

《今天》

北岛在《今天三十年》一文中写道:“《今天》反抗的绝不仅仅是专制,而是语言的暴力、审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琐。”这篇文章写在《今天》被查禁的第三十年。由北岛、芒克创建的这份民间刊物只生存了十八个月,出版了九期双月刊和七部系列出版物。相信现在的年轻人早已是闻所未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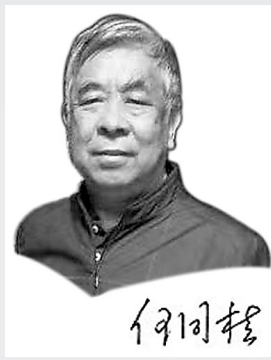
评论界将发表在《今天》上的诗统称为“朦胧诗”。可是北岛却不怎么认这顶帽子。

读李辉编著的《黄永玉的文学行当》一书得知,《今天》创刊号以“动物篇”选发一组“动物短句”,作者署名“咏喻”。

北岛有《回答》一诗。开篇两句:“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,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。”

顾城有诗《一代人》。全诗两句: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,我却用它寻找光明。”

文人掠影



何桐佳

刘宗武的两封信

何桐佳

刘宗武先生的大名,是从安平县文联主席王彦博口中听到的,话题是谈其带几十名作家学者瞻仰孙犁故里的情形。

据说那天恰逢阴雨,乡路泥泞难行,但大家都争先恐后在村头下车,抱着朝圣般的心情踏进这个人杰地灵的村庄。刘先生作为带队人,大步走在前头,打着手势给人们讲解,所以虽撑着雨伞,仍旧淋湿了衣服和头发。当时孙犁故居尚未落成,但那次“朝圣之旅”给这些“犁迷”“荷粉”留下了深深的印象。

听到这些情况,我眼前浮现出的是一个生气勃勃的青壮年形象。及至去年看到他过世的信息和简历(2022年12月31日去世,享寿87岁),才知那次安平之行时,他已是古稀之龄了。

刘宗武不仅长期担任孙犁研究会的秘书长,还主持编选了《耕堂劫后十种》等孙犁著作和研究文集十几种之多。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十一卷本《孙犁全集》的出版说明中,还强调注明:“孙犁之子孙晓达先生对编辑方针提出了很好的意见,刘宗武先生、段华先生在资料的收集和编订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。”

就在那年,我和一位文友写了十几篇孙犁在饶阳土改和创作的系列文章,编成一本《孙犁在饶阳》的书稿,急于找几个专家把关求教,于是就自然想到刘宗武先生。但对这样全国闻名的专家,我们以前毫无渊源,不但未谋一面,甚至未通一信,所以寄去书稿自是抱着尝试的心态。令人惊喜的是,他对这本粗糙的打印稿本十分重视,还热情写来一封近四千字长信,坦诚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。

他首先肯定了我们的努力,鼓励说:“我们素不相识,是对孙老的敬仰、对孙犁作品的喜爱,把我们连在一起了。”“你们对孙犁在饶阳的日子——这恐怕是他一生最困难、早先最受冲击的一段日子,收集到许多宝贵的资料,特别是他的思想情绪,他的工作情况,都做了很全面、很深入、很有说服力的描述,这对研究孙犁一生是很有用处的。”然后又循循善诱提出自己的看法,要求我们“必须准确地把握事实”,“语言要掌握分寸”“要避免篇章段落的重复”“不一定把小说人物对号入座”等等。

接到信后我们非常感动,反复阅读后深受启示,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尽力修改润色。这本小书因为是挖掘孙犁大师一段独特经历,受到很多作家和学者的肯定和赞扬。河北省作协主席关仁山题了书名,《文论报》主编封秋昌作序推介。给刘宗武先生寄书后,他马上回信说:“你们学习研究孙犁的精神是非常宝贵的,我作为曾与孙犁过往二十余年、又在天津市孙犁研究会工作十余年的人,对你们所做的一切,感到特别高兴和欢迎。希望你们继续努力,取得更大的成绩。”他还在信中说:“我把你们的书给孙晓达看了,他同意我的意见,即对孙犁的事要做到真实可信,仔细又仔细,慎之又慎。”并说“这本书我建议你们寄给孙犁的子女孙晓达、孙晓平、孙晓玲及天津日报文艺部……”

原来我们对孙犁子女的情况不甚清楚,可能因为他的介绍,使孙晓达对这本《孙犁在饶阳》留下一点印象。后来参加一次安平县纪念孙犁大师的活动,有幸相遇孙晓达同志,他不但吃饭时与我碰了杯,还赠送一本自己签名的《孙犁纪念文集》。而这部厚厚的文集,主编正是刘宗武和段华。

长期以来,我曾几次萌动拜访刘宗武的念头,但拖延多年却未能成行。想来主要是因了自己的惰性,更与平时怕见名人的怯懦有关。我年轻时因在天津的《文艺》双月刊发过短篇小说,有次赴津出差就带着作品鼓劲想去拜访孙犁,但打听到地址后又突然消失了勇气,所以至今引以为憾。特别是看到大师曾给我紧挨页码发稿的江西作者通信时,更是懊悔莫及。后来结识《孙犁年谱》的作者段华,他听了这件事笑着说:“你那时要给孙犁写信,先生也会回信的。”可惜,我虽终生崇拜孙犁大师,却无语面聆教的机会了。

现在年至老境,自己又想拜访结识曾与孙犁密切交往的专家学者,这是一个业余文学作者近乎痴狂的天真,更是为了稍稍弥补一下心底的遗憾。最近与段华谈到已逝的刘宗武先生,段华沉痛地说:“他本来微信说春季来京聚聚,没想到头一天给我微信,第二天就突然得知他去世的消息。我心里的悲痛,你是可以想象到的。我失去了一个可以倾谈孙犁先生的真正挚友,几次想写他都没写,因为写起来心里会更疼更疼。”

得知我有两封刘宗武的长信后,段华先生非常重视此事,嘱我把文本发他存留,并恳切表示“今后编辑孙犁先生有关书籍时使用”。于是我迅速打印发给段华。这也算对刘宗武先生的缅怀和纪念吧。